

文学达尔文主义视角下希腊神话改写探究 ——以霍桑的《丛林故事》为例

许 晶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4日

摘 要

《丛林故事》是美国作家霍桑的代表性儿童文学作品。他通过改写希腊神话和精准刻画人物心理, 打造出此部儿童文学经典。文学达尔文主义以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等理论基础为依据进行文学批评。据此, 文章从文学达尔文主义视角对《丛林故事》中的叙事技巧、人物塑造以及最后的文学作品呈现进行分析, 探讨此神话改作品所反映的人类与文学的紧密链接, 旨在揭示文学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内在需求, 以此强调科技时代中的文学存续与发展对人类的重要引领作用。

关键词

《丛林故事》, 霍桑, 改写, 希腊神话, 文学达尔文主义

Research on the Adaptation of Greek Myth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Darwinism

—Taking Hawthorne's *Tanglewood Tales* as an Example

Jing X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Received: July 6, 2026; accepted: August 4, 2026; published: August 14, 2026

Abstract

Tanglewood Tales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children's literary work by American writer Hawthorne. Through the adaptation of Greek mythology and the precise psychological depiction of characters, he

created this classic. Literary Darwinism employ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such a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human behavior studies for literary criticism. Accordingly,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textual presentation of *Tanglewood Ta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Darwinism, exploring the inherent bond between humanity and literature reflected in this mythological adapt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literature constitutes an indispensable intrinsic need for humanity and emphasizes the guiding role of literature'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 technological age.

Keywords

Tanglewood Tales, Hawthorne, Adaptation, Greek Mythology, Literary Darwin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纳撒尼尔·霍桑被称为美国 19 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其长篇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然而,人们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其浪漫主义小说,却忽视了他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1851 年,霍桑根据希腊神话改写的《神奇故事》(*A Wonder-Book for Girls and Boys*)出版并大获成功,这促使他于 1853 年推出续篇《丛林故事》(*Tanglewood Tales*)。这两部作品奠定了美国儿童文学的基石,霍桑也因此被誉为“美国儿童文学之父”[1]。此番改写另辟蹊径却极具影响力,不禁引人深思。

霍桑对人物心理的精准刻画是其进行改写的基础。被誉为美国心理分析小说开创者的霍桑,能够敏锐地捕捉人物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感和思绪,将其细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使读者仿佛能走进角色的内心世界,共情于他们的喜怒哀乐、恐惧与希望。因此,当读者能够与角色产生共鸣,改写希腊神话这一素材就更能游刃有余,不受其约束。俄国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在其论著《法文书籍》中评价道:“神话只作为霍桑写作的背景,在此背景上他可以完全自由奔放地去描绘呈现在他想象中的画面和事件[2]。”霍桑在序言中也有同样的表述,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传说故事在任何时候都能为己所用,但需根据时代的要求予以改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作品中的希腊人物形象发生了很多变化,有年龄上的差异、性格上的改变、行为上的变化等等。

文学达尔文主义是一个与心理学有着紧密关联的文学批评方法,它起源于哈佛教授威尔逊提出的“契合”(Consilience)概念,表达的是不同学科之间的联合进而对整个知识体系的整合[3]。约瑟夫·卡罗尔吸纳了此契合灵感并将进化心理学运用到了文学批评中,而学者克鲁斯表示,“学科契合并不意味着一个领域向另一个更基础领域的目标与方法论习惯低头,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脑功能规律,而是众多不同的文本”[4]。从文学达尔文主义视角来看,霍桑对儿童心理的精准剖析与其改写之间也存在密切关联。

在《丛林故事》中,霍桑的改写所运用的叙事技巧映照了卡罗尔对作者的定义:作者是对人讲人的故事的人[5]。霍桑以儿童视角为出发点创作出温情的儿童故事,其动机和归宿都是少年儿童。在他的人物描写和塑造中,人物脱离希腊神话中神明的形象,具备了个人成长与进步的优秀品质,满足当今时代个体精神成长的需求,符合卡罗尔提出的“文学具有适应价值”的观点。即文学是培养和调节人们复杂认知机制的重要工具,它有利于培养人在现实世界的适应能力[6]。从希腊时期进行探索的产物到现代社

会精神塑造的工具，文学也成为人类进化成果的一部分。因此，其最后的文学作品反映出文学本身作为进化的产物，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它是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源于自我需求的精神产物，是人类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呈现出的产物[7]。

霍桑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儿童视角为出发点，顺应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塑造，重构出不同凡响的古希腊神话人物形象，为美国儿童文学创作开启了新篇章，同时也促使身处科技时代的我们，对文学存在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2. 叙事技巧分析：从古典神话到温情故事

古典神话中爱情、复仇、权力争夺是核心主题，情感表达复杂而激烈，并非儿童能理解的内容。然而，古希腊神话是一片富含丰厚文化内涵的沃土，是能够孕育出新的文学作品的母体。其表达的人文情怀是古希腊文明中的精神内核，它以神话的形式为载体，充分地将“人”展现出来[8]。这对应文学达尔文主义中所提及的内容：文学再现的中心主题是人，而作者就是对人讲人的故事的人[6]。因而，古希腊神话具备从古典神话到温情儿童故事的转变基础，且作者霍桑深刻洞察到古典神话原型与儿童的不适配性，在改写过程中呈现出“对儿童讲儿童故事”的叙事技巧，因此造就此次改写的成功。

首先，霍桑在《丛林故事》中创造了一位少年叙事者形象，即布莱特。叙事视角在现代叙事学中被表述为一个聚焦问题，即“我们通过谁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事件”[9]。故事中的叙事者是一个年轻的大哥哥形象，他被孩子们亲切地叫做尤斯塔斯表哥。同时，他以第一人称的身份讲述了整部故事。通常来说，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会从儿童自身生活层面与儿童经验世界入手、关注儿童心灵的作品，大多属于儿童视角。同时，不少作品都以“第一人称”切入，而且以儿童“代言人”的身份出场[10]。霍桑的创作正是如此。他笔下的儿童视角与传统的成人视角截然不同：叙事者并非以成人的眼光去俯视现实，而是真正潜入儿童的内心世界，唯有如此才能构建出纯粹的儿童世界。正如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基于数十年创作经验所总结的定律：真正为儿童写作，就必须选择并坚持“儿童视角”。在《丛林故事》的各章节中，我们都能看到“我”与小朋友们的对话。有对他们亲昵的称呼，“我善良的小朋友们”、“我亲爱的小听众们”等，有同他们感受的共享“我希望你们中间不会有人狠心发笑”、“我很好奇”、“我对此有点儿怀疑”等[11]。通过此类儿童视角与孩子之间的对话会更具有童心，而不是带着成年人的批判性思想。

其次，故事展现了人物具有的丰富情感。霍桑选取的故事情节展开都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情感。其中包含忒修斯寻父、俾格米人为好友安泰俄斯报仇、卡德摩斯寻妹、尤利西斯营救同伴、刻瑞斯寻女和伊阿宋为父报仇六篇故事，故事蕴含亲情和友情这两类对于儿童来说易于理解的情感。在故事的展开过程中，霍桑对体现人物情感的内容施以浓墨重彩。例如，在《俾格米人》中，当安泰俄斯在与赫拉克勒斯交手后不幸身亡时，可怜的小俾格米人看到自己的巨人大哥遭到如此惨祸，哭得伤心不已。作者将他们歇斯底里的哭喊比作惊出巢的小鸟在凄厉、哀伤地啼叫，得以体现人物情感宣泄的程度之深。卡罗尔曾表示，“进化心理学缺乏对人性的观念结构研究”，而“人性是文学再现的基本主题”[5]，他主张通过阅读文学来获取人类更多的行为模式信息。据此，他绘制出一幅人性图谱，其中最下面一层便是人的基本情感，它们有启动和调节行为系统的作用[5]。对于正处于身心急剧发展阶段的少年而言，他们的情感需求主要源于他人的理解与同情。同时，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结交年长、经验丰富且能提供指导的同辈友人[10]。霍桑所选取的亲情与友情的故事就极好地满足了儿童的这一需求。

最后，故事中对于复杂的男女两性关系情节进行了删减。例如，《龙牙》中欧罗巴被一头白牛所带走，但并未告知小读者白牛的真实身份——宙斯。宙斯倾心于欧罗巴，他为接近欧罗巴化身成一头温顺白牛混入牛群，趁欧罗巴骑上牛背时将她带到另一个大陆与其生活。宙斯多情的经历显然不宜展现给儿

童，而他这种自私的占有更称不上是爱。在《石榴籽》中，刻瑞斯四处寻找女儿，但未曾提及她向兄弟波塞冬寻求庇护的经历：残暴的波塞冬将其变为母马藏在马群中，而自己又伪装成一匹种马强暴了她[12]。这无疑是考虑到儿童的心智尚未成熟，不宜接触这种反伦理的男女两性关系。人类在思春期最初产生的对异性的憧憬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向往活动，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10]。霍桑创造的儿童文学给予读者一个有利于自身心灵成长的想象空间，避开此类阴暗思想的影响，超越复杂社会环境对自身发展的局限，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3. 人物塑造分析：从神明力量到精神品质

在神话转变为温情童话的过程中，人物角色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古希腊时期，物质匮乏、自然环境险恶，人类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对自然现象充满敬畏与恐惧，因此对于自身无法掌控的自然现象、命运无常，都归因于神明的意志。神话中人物的经历也同样依赖于神明的力量或命运的安排，而非自身的精神品质或成长所影响。这种叙事虽满足了当时人们解释世界的需求，却难以契合当今时代个体精神成长的诉求，更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个体主体性及精神自主性相悖。霍桑的改写则对人物形象进行了精神化重构，契合卡罗尔提出的“文学具有适应价值”的观点，他强化个体的精神成长，让人物的胜利源于自身的精神特质，如勇气、理性、同情、责任等[3]。这样的人物塑造摆脱了古典神话神明主导人物发展进程的局限性，将人物形象塑造为优良精神特质的具象化载体，文学作品本身也具备了适应价值的特点。

以《牛头怪弥诺陶洛斯》为例，霍桑对主人公忒修斯重构的核心是去神化，即将忒修斯的形象从神的后裔转化为人类英雄。在希腊神话中，原型忒修斯曾在加入献祭的年轻人的行列前向阿波罗和阿佛罗狄忒献祭，且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此外，克里特王室的公主阿里阿德涅一见到风流倜傥的忒修斯就爱上了他，进而给予他诸多帮助[12]。而在霍桑的叙事中，忒修斯决定请缨前往克里特岛诛杀弥诺陶洛斯，其动机源于他对雅典人民的怜悯与作为王子的责任心。作为这个国度的王子，当他看到雅典的父母因担忧孩子的安危而哭泣，看到年轻人眼中的恐惧，他带着不惧牺牲的勇气加入献祭的行列。而阿里阿德涅也是被他英勇无惧的气概所吸引，进而作出给予他帮助的行为。此种改写方式在《喀耳刻的宫殿》中也有出现，尤利西斯为救回同伴只身涉险，他不再仅凭魔草抵御魔力，而是凭借自身的理性和对使命的坚守得以站稳脚跟。化身为奎克西尔弗的赫尔墨斯赠予尤利西斯的雪花花朵并非是抵御魔法的神药，更像是守护理性的盾牌，是尤利西斯自身的坚守才抵挡住了喀耳刻的魔力。面对喀耳刻“你已饮下魔酒，再也不能做人”的厉声呵斥，他非但没有动摇，反而显得愈发英勇刚毅[10]。自此，尤利西斯展现出超出常人的勇气与坚定，此去神化的写作手法使得人性高贵的一面得到彰显，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笔下人物的人格魅力。在《人类的起源》中，达尔文确定了人类三个主要的社会品质：同情、尽责和勇气。他认为，这些社会品质是由自然选择的过程产生的[5]。霍桑的叙事恰与这三点相吻合，他通过去神化的方式将这些品质进行放大，塑造出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人物角色。上述的“同情与尽责”品质则恰好呼应了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的“友善”与“敬业”要求，从而印证了该文学作品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霍桑还以希腊神话故事为母本构建新的人物关系，将其想传达的人物精神通过此种方式展现出来。最典型的例子如《俾格米人》，作者将俾格米人与安泰俄斯设定为大地母亲的同胞兄弟，这一核心关系贯穿了故事的始终。而在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是在十二试炼的拓展任务中遭遇安泰俄斯的阻挠，因而与其产生斗争并将其杀死，并未出现俾格米人与他们二人关系的联结[12]。但通过霍桑的改写，此人物间的关系将三者的形象都立体化了。其一，由于安泰俄斯与俾格米人间深厚的情感，在安泰俄斯牺牲后，俾格米人选择举全国之力和赫拉克勒斯战斗，为他们的兄弟报仇。俾格米人在此展现出了团结一致抵抗

敌人的勇气与智慧。其二，赫拉克勒斯在知悉俾格米人对安泰俄斯的情谊后，选择主动退让，还他们一片安宁。赫拉克勒斯并不恃强凌弱，反而心怀敬意，产生一种英雄相惜的情谊。其三，安泰俄斯因为有俾格米人的陪伴不再孤单，而他也为俾格米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例如，当他们需要一阵轻风转动风车时，巨人就会用肺部自然呼出的气息吹动风车的翼板。烈日当空时，他就会坐下来，用自己的影子为全国的俾格米人遮挡阳光。由此可见，安泰俄斯是一个可靠憨厚的好伙伴，值得相处。这些都是希腊神话中未出现的情节，但却创造出了三个值得人们学习的好榜样形象。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化解了故事中的小矛盾，而这种精神若置于现实社会，同样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

此外，霍桑笔下出现的教导性话语是最直接的精神指引。例如，在《金羊毛》中，伊阿宋在面临自渡与助人过河的两难抉择时，铭记起半人半马导师喀戎的教诲：“济贫扶弱才是最高贵的行为”、“对待年轻妇女要像对待自家姐妹，对待上了年纪的妇女要像对待自己的妈妈”。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地，背着老婆婆渡河。达尔文曾提出，“对所有生物无条件的爱是人类最崇高的属性”，可作为人类社会关系中的主导调节力量[5]。文中的伊阿宋就被塑造为这样心有大爱的人。同样，在《俾格米人》中，小演说家呼吁众人维护国家荣耀、为兄弟安泰俄斯复仇的言辞，也极具感染力。此类话语对儿童具有深刻的精神引导作用，高度契合现代文学对个体思想观念的引领作用。

4. 作品影响分析：从创作文学到定义文学

当今科技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发展对于文字撰写等领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学的必要性也被人们所质疑，因此深挖文学背后潜藏的价值刻不容缓。霍桑在《丛林故事》中对希腊神话的改写，不仅为儿童文学提供了极具可读性的范本，更彰显了文学的本质意义。

首先，文学本身作为进化的产物，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卡罗尔也强调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对于文学的功用，他列举了六条：文学作为规训思想的工具；阅读文学指导实际生活；写作为展现本性魅力；文学将人们融入同一文化；作为宗教或者愿望实现的文学；写作的无用性反倒成为吸引异性的特征[7]。霍桑的改写正是展现文学功用性的一次文学实践，他笔下的儿童文学既保留了古典神话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对人思想道德的健康引导。霍桑在这一道德伦理上的强调则为当代文学存在意义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范本，他对于书中的人物角色始终坚持道德模范式的塑造，为读者提供了一次思想洗涤的机会，并指导实践。

其次，文学是情感适应的重要工具。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79)曾提出“生命即发现与解决问题”。作为适应性生物，我们始终致力于探寻真理。科学的使命在于帮助人类发现“更完整、更全面、更具趣味性、逻辑更严密且更具现实意义的真理”，这里的“现实意义”指的是“与人类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5]。如今，科技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已远超前于人类的普遍认知，但是人工智能的情感缺失问题仍难以解决。“威尔逊曾强调了科学的包容性和民主性，言下之意是科学可以容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事实也的确如此，人工智能的不断迭代呈现出对于人类情感思维模仿的匮乏，而文学作品则能对这一现状起到改善作用[7]。正如《文学动物：进化与叙事的本质》(*The Literary Animal: Evolution and the Nature of Narrative*)编者高兹夏尔曾言，“文学的好处之一就是能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而文学作品所提供的情境则能成为人工智能体验的素材，帮助其不断进步发展。但高兹夏尔也表示，“文学事件的陈述中缺少一种直接性，这是和实验科学完全不同的”，因而，文学只能作为现实逻辑的补充[7]。霍桑的《丛林故事》则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只不过其落脚点在于满足儿童的心理需求。对儿童而言，该书构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情感体验场，旨在为其精神探索与情感共鸣营造适宜的氛围。通过对情节和人物形象的重塑，霍桑使儿童能够无拘无束地徜徉于文学世界，免受反道德伦理情节的负面影响。这部作品虽未直接教导儿童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道德难题，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其健全人格，为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础。

再者，文学是精神传承的文化“基因”载体。人类的进化不仅体现在改造世界，更要有精神进化。正义、勇敢、理性、共情等美德，是人类通过文化传承积累的精神财富，为当代道德伦理问题的解答给出重要的参考依据。文学作为文化“基因”的载体，将精神文化附于人物角色中，使其得以代代相传。在《丛林故事》中，霍桑将希腊神话中“对光明的追求、对内心的求索”等精神内核，转化为个体的精神成长轨迹。比如忒修斯，从誓要斩杀弥诺陶洛斯，到最后举剑时却闭上了眼睛，默默祈祷对方安息。他的勇猛无畏最后与共情怜悯之间产生了平衡。他理解了真正的胜利不是消灭怪物，而是终结痛苦、坚守责任，并由此完成了内心的求索。扁平化的故事难以深入人心，富有文化内核的文学才能肩负起载体的任务。《丛林故事》一书跨越时代，既传递给 19 世纪的美国儿童，也滋养着现代读者。在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易导致精神迷失的当下，文学通过精神特质的传承，引导人类坚守人文精神，实现精神的永续成长。

5. 结语

霍桑的《丛林故事》中人物单纯而真挚，他试图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展现给读者。而这一改写不仅是为孩子们打造出一个价值观塑造的范本，更启迪了人们对于真善美优秀道德品质的追求。正如卡罗尔所宣称，“文学是储存关于人性信息的唯一宝库”[7]。在科技高速发展、文学地位被动摇的现在，文学经典依旧以夺目的语言魅力展现其独特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1] 金燕玉. 美国儿童文学初探[M].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
- [2] 周忠和. 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M]. 郑州: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3.
- [3] 威尔逊. 论契合: 知识的整合[M]. 田沼,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4] Jonathan, G. and Wilson, D.S. (2005) *The Literary Animal: Evolution and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5] Carroll, J. (2004) *Literary Darwinism: Evolution, Human Nature, and Literature*.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505274>
- [6] 余石屹. 达尔文进化论与 21 世纪的文学批评[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28(3): 47-54, 159.
- [7] 胡怡君. 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学达尔文主义[J]. 外国文学, 2011(2): 118-124, 159-160.
- [8] 赵平. 古希腊神话对英美文学的影响研究[J]. 山西档案, 2019(2): 174-176.
- [9]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0] 王泉根. 儿童文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1] Hawthorne, N. (2010) *Tanglewood Tales*. Yesterday's Classics, LLC.
- [12] 菲利普·马蒂塞克. 希腊罗马神话[M]. 崔梓健, 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